

劉節金陵大學職事考略

洪光華 張求會

[提要] 1940年,劉節經其老師陳寅恪介紹,來到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工作。短短四個月後,因人事糾葛,劉節突然離去,隨後又婉拒金大的再次相邀。劉節在金大雖然只工作了一個學期,依然恪盡職責,堅持完成了約定的研究工作,兩部書稿(《廣韻聲類》和《廣韻》校勘稿)和一篇論文(《強獨樂碑跋》)是其從事學術研究的重要成果。離任後,劉節將借自金大的圖書資料逐一寄還,與擔任研究所職事一樣絲毫不苟。而劉節與研究所所長李小緣等人的往來書信,也為研究抗戰時期學人學術與社會提供了十分難得的一手資料。

[關鍵詞] 劉節 金陵大學 職事

[中圖分類號] K82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2-0187-08

劉節(1901~1977),字子植,浙江溫州人,著名歷史學家。抗戰時期,劉節曾在戰時金陵大學工作了一個學期。因來去匆匆,其經過仍不甚清晰,研究界也一直鮮有關注。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後,金陵大學被取消,部分檔案為南京大學接收,其中就包含了當年劉節與金大李小緣等人往來的一批信件,通過分析這批信函,結合劉節日記等相關史料,大體上可以理清劉節在金大到任、履職、離任等基本情況。

到校與離校

1940年2月5日劉節從戰時浙江大學辭職,3月10日仍在貴州,3月27日到達重慶,4月上旬到達戰時金陵大學(成都)。^①金陵大學檔案(今存南京大學)保存有一份劉節1940年6月22日領到該校四四八號校徽的收條。^②末鈐陰文“永嘉劉節”印。

南京大學接收的金大檔案中,另有劉節親筆所填《金陵大學教職員調查表》,表中載明劉節“到校年月”為“民國二十九年二月”(1940年2月),比實際到校時間提前了兩個月。個中原因,是金大接受了劉節“自二月份起薪”的請求:“懇請兩兄與學校當局商量,自二月份起薪。弟有《廣韻聲類》研究稿,稍稍整理即可發表。並盼電寄一月薪水,弟即可北行,共襄盛業。”^③“兩兄”者,李小緣、商承祚(詳後)也。

同信劉節還寫道:“日前得昆明方面消息,知貴校文化研究所正在延攬人才,力圖發展,寅恪師即

以賤名奉達左右，私以為喜。”據而可知，劉節赴金大任職，原來是經過其老師陳寅恪推薦的。陳寅恪1940年3月12日致劉節信中仍言及此事：“金陵大學環境似較好，姑得其覆書再酌。將來雲南大學若有機緣，似亦可設法。但據雲大友人言，待遇尚可而別有難處之事，紛紛求去，則又不知其內容實情究如何？總之，先俟金大回音，然後別圖可也。”^④

讀《劉節日記》，^⑤可知劉節1939年在浙大的工作以授課、講座為主，而他課餘勤奮做研究，故此時手頭還有幾種未發表的手稿，包括這部始於1930年河南大學期間的《廣韻聲類》書稿^⑥。現劉節希望以此書稿作為金大的職務成果，並沖抵二月、三月的工作量。

關於工作內容，劉節在隨後的另一封信裡商量道：“所任課如在中國通史、文化史、上古史三門中擇一均可，他課暫不擔任。”^⑦受制於現有資料的匱乏，目前暫難斷定劉節在金大是否承擔過教學任務、講授過哪些課程。與此相關的是，後來與劉節共事於中山大學歷史系的蔣相澤，正是金陵大學1940屆畢業生。蔣相澤在金大有沒有聽過劉先生的課，其畢業論文《詩經中所見到的周代社會》有沒有得到劉先生的指導，同樣需要挖掘新材料進行深度研究。

出人意料的是，在劉節到校短短四個月後，1940年7月30日，劉節突然離開了金大，甚至沒有向文學院院長劉國鈞（字衡如）、文化研究所所長李小緣（名國棟，字小緣，以字行）、好朋友兼同事商承祚（字錫永）面辭，只留下簡單一函：

弟今早東歸，不及走辭，至為悵念！八月份薪到期，請寄重慶貳零陸號信箱西南運輸處劉仲博君轉下，至感！

有信請妥轉重慶二〇六信箱劉仲博收。

“劉仲博”即劉約，劉節二弟。

同一批資料中，夾藏著另一紙：

前奉一札諒已到達，頃因東歸省親，一時不易西來，研究所職事已不能擔任，敬向先生及小緣先生辭去下年度職事。尚有本年度薪水，到期請囑會計處惠寄。拙作兩種即將寄奉為荷。

因同為當年金大的文檔，該紙必是劉節所寄而不是劉節的信稿。信中與李小緣同時提及的“先生”，似為劉國鈞。此字條沒有上下款和日期，但從上下文來看，估計此紙是寫給文學院院長劉國鈞的信中所夾字條，時間或在7月30日後不久（劉節沒有收到回信，且八月薪水尚未收到），因涉公務而轉交研究所了。

字條提到“前奉一札”，或即上述7月30日函。在字條裡，劉節同樣講到自己回鄉和所餘薪水匯寄事。補充說到的，是職事所繫的論文兩種，自己保證交差。而“辭去下年度職事”，是為重點。

關於“東歸省親”，接妻子和兩個兒子前來一起生活，不是劉節到金大才有的打算，1939年他在浙大時就有此想。如1939年12月9日劉節日記寫道：“在文學院辦公室晤郭洽周兄（1900~1987，名斌齋，字洽周），郭兄勸我勿急急南歸，暫至貴州，且待明年暑假再作挈眷之計，余細思亦有道理。”後來因為發現史地系主任張其昀暗中排擠自己，劉節在1940年2月堅決辭職，離開浙大。^⑧

1940年7月30日正值暑假期間，劉節東歸省親本屬正常，但不辭而去，接著又辭職，這就有點奇怪了。

原來，和在浙大一樣，劉節在金大還是碰上了讓他不能忍受的事。其程度之嚴重，令他忍不住於7月3日寫信向校長陳裕光投訴：

節在貴校純以研究學術為前提，不識人間顛倒黑白之事，同人中如有誇張為幻者，則必

違道日遠，何能相處？先生主持全校，節又初來，特相奉告，以明本心。

劉節說，自己專心於學術研究，不會搞陰謀耍手段。劉節直指同仁中有人造謠污蔑他，這樣下去如何同事？他說自己初來乍到，只能向大學的最高領導人稟告，一則表明自己光明磊落，不懼別人的詆毀，另一方面，當然也希望校長出來主持正義。從此信明顯看到劉節的憤怒，他這樣處理是否恰當，他是否又犯了他時時提醒自己切勿太直太躁之忌，我們不好妄作評斷。從現有資料分析，劉節棄金大而去的原因，極有可能與離開浙大相類似，是忍受不了人事紛爭。

陳裕光校長極為重視，且慎重地處理此事，希望把事情解決好。他親自擬好信稿，於8月10日先給劉節的上司李小緣過目，徵求意見：

茲附上致劉子植先生函稿一件，敬希核正擲還，以便繕就寄發。

金大檔案所存，估計是接收和發出文件的底稿。李小緣當時可能在陳裕光的函稿上作了修改後，直接退還而沒有抄錄留底。而在陳裕光覆劉節信發出之前十餘天，即1940年7月30日，劉節已經離開金大，因此也有可能此信根本就沒來得及寄出。

劉節投訴的具體是什麼事，陳校長是怎麼回覆他的，又準備怎麼處理，暫時沒有其他資料可以說明，仍需等待將來有新發現後再作討論。

拒返金大

時間過了一個月，劉節還只來到重慶，未能繼續東行。1940年9月1日，劉節寫信給李小緣、商承祚：

在嘉定接奉大教，因匆促東下，未得奉覆，至歉！弟東歸之後擬就中英庚款協助，得暇尚可完成承囑研究未畢之作。借書五種，乞稍寬假，決不至失落也。拙作稍待即寄。

一路東來，傳染病甚普遍，迄今尚在喘息未定中，不知人間尚有清淨之地否！

八月份薪到，即當報覆。

“接奉大教”，應即李小緣1940年8月28日致劉節函，因此函說到已給劉節寄出八月份薪水，所以劉節覆函說“八月份薪到，即當報覆”（詳後）。這裡說的“嘉定”，並不是上海附近的嘉定。早在1939年，劉節就曾在日記裡九次提及“嘉定”，說的都是古稱嘉定州或嘉定府的四川樂山。如1939年7月9日日記：“下午接吳子馨信，囑余能早日赴嘉定，余尚遲疑未決。即覆一函，告以近來情狀。”吳其昌（1904~1944），字子馨，劉節清華研究院時期的同學，此時在內遷於樂山的戰時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歷史系主任。劉節1939年7月29日日記所說的“今日張江樹、胡旭之、周雪鷗三人同舟赴嘉定”，所指同樣是樂山。其時，劉節與物理學家張江樹（1898~1989）、數學家胡旭之（1901~1959）、周雪鷗（1902~1975）三位一起到成都，為教育部的暑期培訓班（劉節日記中稱作“暑校”）授課，住華西協和大學（位於華西壩）。

信中說“一路東來，傳染病甚普遍，迄今尚在喘息未定中”，可知劉節其時疲憊不堪，狼狽不堪。離亂之中，他感歎到：“不知人間尚有清淨之地否！”

劉節在信中向金大保證，一定完成所欠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任務。不難看出，劉節雖然離開了金大，但與金大的職務聯繫仍然延續著。

劉節原本計劃回溫州接來妻兒後，就任中英庚款資助研究員之職。到金大履職前，劉節已經託老師陳寅恪幫助疏通庚款資助研究員之事，故而陳寅恪1940年3月12日致劉節函有謂：“前月得來函，即與孟真商量後，知今年庚款協助非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前申請不可，且已審查訖，更難設法。弟曾

與當局商量，與此次兄事類似者別有他例，亦格滯難了，故英庚款協助事，暫時必不易也。”^⑨

千山阻隔，劉節最終還是未能回到溫州接來妻兒。杭立武 1940 年 11 月 15 日致李小緣信這樣寫道：

茲啟者：曾受敝會協助研究之劉節君，嗣在貴文化研究所承受指導從事研究。月前擬返里歸去，現因交通關係難以成行，不識貴所研究工作尚有需要否？

敬此奉達，還祈示覆為荷。

杭立武(1904~1991)時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相信劉節滯留重慶時與他見面，主要是為了申請中英庚款會協助研究員之事。而十一月份仍未是安排庚款會研究員計劃的時間，因此杭立武主動幫劉節詢問李小緣，可不可以讓劉節再回金大工作。信裡說劉節“曾受敝會協助研究”，“協助”意即“資助”。1939 年，去浙大任職前，劉節曾任庚款派駐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員一個學期，即前述從重慶到成都為教育部“暑校”開講座及此前的半年時間。

李小緣於同月 19 日立即回信杭立武：

頃奉十五日大緘，承示劉子植(節)先生行蹤，甚感！

子植先生於暑期間束裝離校，所中因不知行蹤，以為一時東歸省親，無法續聘。今承惠示，自應續聘，繼續其所計劃之研究工作，並酌授史學課程，並指導研究生。待遇仍舊，自到所之日起薪。不知子植先生有意屈就乎？盼速詢明示覆，以便辦理聘約手續。敬希鼎力斡旋，不勝心感之至。

李小緣表示歡迎劉節回來繼續做原來的研究工作，並授史學課，指導研究生。因為李小緣知道劉節 7 月 30 日突然離校事出有因，現在杭立武出面相商，他卻預感劉節不一定願意回來，所以他說“不知子植先生有意屈就乎”，希望杭立武從中斡旋勸說。

估計杭立武去信李小緣代求職事之前並沒有跟劉節溝通，總之劉節沒有接受杭立武的好意，並請他“好為言之”，代向李小緣婉拒其再次相邀。1940 年 11 月 27 日劉節致杭立武函這樣寫道：

頃承手示並附李小緣先生函均已收悉。盛意殷殷，感何可言！日前晤教曾將鄙懷奉陳一二，當時匆匆，諒蒙明察。今暑辭去金大研究所事東歸省親，道經重慶，留滯不得遠行，棲遲至今。已有友人代為設法，行將成功。雖為暫時性質之職務，亦不能見獵心喜，有負朋友之好意，因此金大事不便接受。曾憶今年春間接金大聘請後，自貴陽經渝之日，亦有他處友人邀約，即時報謝。弟之誠意前後如一，即希轉謝小緣先生為荷。至於前在金大未完工作二種，俟生計稍定，即當陸續寄奉。並請好為言之，至為感禱！

日前託孫洪芬先生轉達聲請書一份，即請於下屆審查時加入。不勝感謝！

劉節請杭立武轉達婉拒李小緣的理由，是已有人幫忙在重慶找到工作，不可反悔，一如當初去金大時也有其他的機會，同樣婉拒了。而傳遞給杭立武更重要的信息，是“請於下屆審查時加入”自己的名字，以成為中英庚款會協助研究員，自己一意堅持等待。劉節託孫洪芬(1889~1953，名洛，字洪芬，以字行)將自己的申請書轉交杭立武，孫氏時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秘書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負責保管、分配、使用美國返還的庚子賠款，用於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與中英庚款會的工作性質相類似。次年，劉節如願成為中英庚款會資助的研究員，直到 1944 年夏。四年間，他寓居重慶南岸黃山路中川江旅館潛心研究，寫下了不少傳世之作。

未竟之職事

1940 年 11 月 27 日劉節致杭立武函中說“前在金大未完工作二種”，而李小緣 1940 年 8 月 28 日

致劉節的信稿說的是兩書一文：

茲謹奉遵(尊)囑,特將先生八月份薪金,計貳百五十一元整,交中國銀行奉上,敬希查收示覆為荷。再者尊著二種及《強獨樂考跋》一文亟待付印,如已脫稿,希早日賜下。

啟者:前假書籍,因需參考,尚有未曾歸還者,茲因本所同人尚需閱讀,希早日歸還為盼。

從此函可知,金大在1940年8月28日通過中國銀行給劉節寄出八月份薪水。月薪251元,以教授職級計,似稍偏低。^⑩

至於劉節“所任”工作,1941年1月8日李小緣致劉節信稿仍然指兩書一文:“所任《強獨樂跋》一文料刻已殺青,……其他二稿何日完卷?”^⑪

兩書一文,便是劉節即便離開了金大,也執意堅持完成的“所任”之事。其中,《強獨樂碑跋》一文和《廣韻聲類》一書是確定的;《廣韻聲類》一書作為劉節在金大的工作,在劉節抵達金大之前雙方已約定,前文已提及,此不贅述;那麼,另外一“種”或另外一“稿”又是什麼呢?

1941年2月20日劉節致李小緣函說“《廣韻》校至第四卷”,7月28日李小緣致劉節信稿稱“《廣韻》已校至第四卷”,8月3日劉節致李小緣函略謂“《廣韻》僅差一卷”,^⑫在在說明:另外一種或一稿,應是劉節所校勘之《廣韻》。劉節1941年2月至3月日記,也有多處提及正在點校《廣韻》。

此外,1942年7月27日李小緣致劉節信稿,也為上述推論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敬啟者:校中學期結束業已月餘,因俗務所羈,未能致書慰問,諸其原諒。我兄前假之書除已還各書外,尚有:《切韻考》內外編二冊,《四聲切韻考》一冊。如已用畢,祈為寄下。至孟森之《清朝前紀》,祈為代檢,如無即作罷,如有仍祈寄還。

前承惠允之稿《校勘記》一書,如已殺青,亦祈賜下,以便付印。此稿結束如有大文賜登學報或專著,當收為叢刊,則當以稿費計算,我兄之處自當從優。不識尊意以為何如?近況若何,每以為念,便中祈示知一二。

李小緣在信中明確說道,此“《校勘記》”為劉節此前“惠允之稿”,而非劉節從金大借而未還之圖書——周祖謨著《廣韻校勘記》(詳後)。而“此稿結束如有大文賜登學報或專著,當收為叢刊,則當以稿費計算”,進一步證明校勘《廣韻》確實是劉節在金大應盡之“職事”。為了向劉節約稿,李小緣承諾:一旦劉節還清“文債”——《廣韻聲類》一書、《廣韻》校勘本一書以及《強獨樂碑跋》一文,再刊登其文章或出版其專著,就要另付稿費,並且“從優”計酬。

強獨樂碑,即北周強獨樂為文王造佛道二像碑。劉節為此碑記作跋且成為就職於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的一項工作,最早源自劉節在1939年成都“暑校”期間到金大拜訪李小緣,他在當年8月4日的日記中記道:

十時半訪李小緣於金陵大學,於其文化研究所中得見新津所出漢石棺畫像兩塊,該所正在傳拓中,與《美術生活》中所見者相同。此外尚有梁中大同六年造像拓本一幅,及北周強獨樂碑拓本一幅,聞二刻皆在四川新都縣。此外該所覓得漢磚數十方,該所在蜀中所得者真不少。

1941年2月20日劉節致函李小緣,將“《強獨樂碑跋》凡十一頁奉上”,^⑬但劉節1941年2月27日日記說的是:“今日寄強獨樂碑跋至金陵。”李小緣回覆:“三月三日接奉手緘及《強獨樂碑跋》一文。”^⑭總之,作為劉節金大職事之一的“一文”,確已順利完成。

劉節的《強獨樂碑跋》,最終以《北周強獨樂為文王造佛道二像碑記跋》為題,在《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上正式發表。《金陵學報》為鄭重其事,特意配上編者按,稱許劉節所作考證:

今劉子植先生復為文證其謬誤,考其得失,精心之作,遠過前人。使此重要之北周史料,因劉先生文而流傳益廣,寧非幸事。但劉先生遠處行都,復有一二載籍,未暇披覽。今由編者考核眾本,作異字表附於文後,又錄陸氏《跋尾》,以便比較,幸覽者祥焉。

載有劉節《強獨樂碑跋》的《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文史專號”),出版時間標作“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月”。據《金陵大學金陵學報簡章》,該刊“年出兩期,於五月、十一月出版”,故此合刊標為“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月出版”。令人費解的是,劉節於此文篇末自題“三十年二月二十日於渝州”,據而可斷該期《金陵學報》之出版時間只能遲於1941年2月,不可能提前在1940年5月或11月問世。到底是雜誌誤標,還是劉節誤署?有必要稍作考辨。

1948年2月21日,正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劉節致函李小緣,告訴對方終於在《金陵學報》上看到了自己的文章:

去歲於陳伯瀛兄處見《金陵學報》,知拙作《強獨樂碑跋》已承刊入,至為感謝!弟之《廣韻聲類》稿草成已數年,本早欲奉寄,但弟有一計劃,欲每一類作一小序,以言其聲類分合之故。今讀輔仁大學所作《廣韻聲系》已出版,甚好!與弟之所述有相異處。《聲系》,實以《說文》為主,實當名《廣說文聲系》。弟書,則純以《廣韻》為主也。茲先將總序奉寄,乞正之。又,《文史集刊》一冊附上。即請檢收。如能將《金陵學報》及單行本惠下,至感至感!尚有文化研究所書籍數種欲寄還,得覆即寄。

附《廣韻聲類》序一篇,《文史集刊》一冊。

陳伯瀛(1900~1975),名登原,原名登元,字伯瀛,時與劉節同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同時刊登了陳登原的《廣癸已類稿君子解》一文,故陳登原持以告知劉節其文章已發表。

回到出版時間標注和成稿署時的問題上來,據姜慶剛先生研究,為了保證印刷質量,抗戰爆發後,《金陵學報》送往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進行印製。《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之稿件,原本已於1941年送上海排版,不料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公共租界為日軍佔領,致使該期《金陵學報》未能如期出版。延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印刷廠纔將倖存的製版付印面世。這就是劉節直至1947年——完稿、交稿數年後——纔在廣州見到該期雜誌的原因。^⑤換言之,“三十年二月二十日於渝州”自屬精準,“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月出版”亦無錯誤。

附於1948年2月21日致李小緣函末的,是劉節《〈廣韻聲類〉序》一文。劉節在序文中自述成書經過:“堅處南郊逆旅中從事靜修,迄今四歷寒暑”,在極為困厄的環境下,嘔心瀝血,最終完成了這部十多萬字的書稿。稿成之後,劉節精益求精,“欲每一類作一小序,以言其聲類分合之故”。身處戰亂而求精工,豈能盡遂所願?果不其然,這一延宕最終使得書稿散佚,迄今難尋蹤跡。同樣命運多舛的《廣韻》校勘本,也未及向金大交差而金大已不復存在。好在劉節後人精心護存此的書稿(五冊),據悉已由中華書局列入出版計劃,^⑥總算可以借而了結劉節對金陵大學的另一樁“欠賬”。

歸還借書

為了完成在金大的職事,劉節借閱了不少金大的圖書,作為從事學術研究的必備材料。因為來去匆匆,部分圖書的歸還延緩到了他離開金大之後,於是,借書、還書也就成為與其本職工作關係密切的特殊“職事”。

1940年7月24日劉節已準備離開金大，先還書十一種，“尚有《強獨樂碑》拓本又書五種留此應用”。^①

1940年7月30日劉節離職後，李小緣除了催促劉節“所任”工作之稿件，就是催請其歸還所借之書，而且是鏗而不捨地催——1940年8月28日信：“前假書籍……希早日歸還為盼。”1941年7月28日信：“所參考各書，計書五種十五冊，拓片一種一張，所內有其他研究員待用，盼速寄還。”1942年2月10日信：“前假敝所圖書料已用畢，祈早日歸還。”^②

拓片一種一張，即《強獨樂碑》拓本。借書五種十五冊，分別為：《廣韻》，澤存堂本，五冊；《廣韻》，《四部叢刊》本，一冊；《廣韻校勘記》，周祖謨校，五冊；《切韻考》內外編，三冊；《四聲切韻考》，一冊。

1941年8月3日，劉節寄還《強獨樂碑文》拓本。^③1941年8月2日劉節日記亦有記載：“作函寄吳子馨、顧如、青年讀物編輯會、北平圖書館、李小緣。”

1942年2月24日李小緣致劉節函略謂：“頃奉二月十八日華翰暨書籍兩包，內有：《廣韻》，澤存堂本，五冊；《廣韻》，《四部叢刊》本，一冊；《廣韻校刊（勘）記》，周祖謨校，五冊；三書已收到，請釋念。……其餘《切韻考》及《四聲切韻表》二書，用畢祈隨時寄還。……孟森《清朝前紀》一書，出考題後又復假去，近因有人詢問此書，因而想起一詢。如在尊處祈賜還，如真不在作罷可也，此間亦在查詢中，如有所得，當即奉聞。”^④也就是說，拓片與書三種十一冊此時已寄還。而孟森著《清朝前紀》一書下落不明，李小緣順便問是否在劉節處。劉節1942年7月31日回覆李小緣說，《四聲切韻考》及《切韻考》內外編仍要使用，需“待《廣韻聲類》書成後奉還”。而《清朝前紀》一書，劉節表示在金大時用完已還，不在己處。^⑤

1948年3月12日，劉節覆函李小緣：“茲交郵奉還《切韻考》二冊，《切韻考外篇》一冊，《古韻標準》一冊，前借各書均已還清，收到即祈示覆為感。”^⑥《切韻考》二冊、《切韻考外篇》一冊，即《切韻考》內外編共三冊。根據“前借各書均已還清”一句推測，劉節所稱“《古韻標準》一冊”，很有可能就是《四聲切韻考》。

尤其值得一說的是，從研究所收函標註收件日期、發出信件留存底稿等細節可以看得出，李小緣做事非常嚴謹、認真、細緻。李小緣原本就是圖書館學的專家，曾任金陵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圖書館西文編目部主任、圖書館館長、中華圖書館協會副執行部長兼編目委員會委員，故而對館藏的完善完美，可謂有近乎強迫症的追求，這從他不厭其煩地親自催促劉節還書即可管窺一斑。而作為領導者的李小緣，字裡行間也頗見識才、愛才、容才之胸襟氣度——劉節到校前幫其爭取兩個月薪水，劉節突然離去後依然溫文相待，催交文債、催還借書之際仍然充滿信任和期待——時時處處讓人感受到這位大家的高尚為人。

這樣，從1940年抵達金大開始借書、從事研究，到1948年歸還所有借書，八年的戰火、離亂，沒有改變劉節、李小緣對各自職事一絲不苟的態度。而從中反映出來的，是一代學者對中華民族必將勝利的信心，和以文化傳承為己任的高度責任感。

[感謝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姜慶剛博士提供南京大學圖書館藏相關信函副本；感謝匿名評審者提出中肯而專業的意見]

①洪光華：《從新發現材料推測劉節離開浙大時間》，北京：《中華讀書報》，2017年6月7日。

②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以下引用劉節、李小緣、杭立武等往來信件，凡未另作說明者皆據南京大學圖書

館所藏檔案而來,不再出註。

③1940年3月10日劉節致李小緣商承祚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④陳美延編《陳寅恪集 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24頁。劉節1939年6月12日日記略謂:“顧頡剛約余至雲南大學教書,余尚遲疑不能決,當函寅恪師商之。”時顧頡剛仍為雲南大學教授。

⑤劉顯曾編:《劉節日記(1939~1977)》,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以下引劉節日記有日期者,不另作註。

⑥據劉節《廣韻聲類序》(未發表),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⑦1940年3月19日劉節致李小緣商承祚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⑧參見洪光華:《劉節與張其昀的恩怨》,北京:《中華讀書報》,2015年10月14日。顧頡剛1940年4月27日日記:“子植見告,渠去年到浙大,彼校罵胡適之,罵顧頡剛,成為風氣。嫌彼與我接近,曾為《古史辨》第五冊作序,強其改變態度,彼不肯,遂受排擠。”見《顧頡剛日記》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68頁。

⑨《陳寅恪集·書信集》,第224頁。

⑩據《中國社會科學界傳略》(第4輯)所錄《商承祚自傳》,1932年商承祚進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時月薪為280元。而1939年10月李小緣致函聞一多,邀其出任文化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國文教授,“薪金每月三百元整,實付無折,此為敝校最高之額數”。引自徐雁平:《聞一多與李小緣往來尺牘九通》,北京:《文獻季刊》,2000年第2期。

⑪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⑫此段提及各信,原件皆藏於南京大學圖書館。

⑬1941年2月20日劉節致李小緣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⑭1941年7月28日李小緣致劉節信稿,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另,劉節1941年7月31日日記有記:“傍晚返寓接李小緣函。”

⑮2018年11月7日姜慶剛與洪光華微信交談記錄。另,姜慶剛發來第八期《金陵學報》(1938年)《金陵大學金陵學報簡章》頁(類如牌記頁或版權頁)影印件,其中顯示:“印刷者: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⑯參見洪光華《淺說劉節先生〈廣韻聲類〉書稿》,浙江溫州:《溫州讀書報》,2016年第11期。

⑰1940年7月24日劉節致李小緣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⑱李小緣致劉節各信,原件皆藏於南京大學圖書館。

⑲據1941年8月3日劉節致李小緣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⑳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㉑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㉒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作者簡介:洪光華,澳門城市大學《社會經濟發展研究》雜誌副主編,博士;張求會,廣東行政學院教授。廣州 510053

[責任編輯 陳志雄]